文研讲坛(之十二)——俗文学文献学的构建

主持人语

传统古典文献学是主要以印本书籍为对象、以经史典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学术体系,它并不完全适用于文本缺乏经典性且富有流动性的俗文学文献。伴随着近年来俗文学文献研究的蓬勃展开,探索构建一个既取法古典文献学,又具有一定独立性和指向性的"俗文学文献学",已成为颇具紧迫性的课题。承蒙北大文研院和中文系联合举办的"作为方法的文献学"系列论坛的邀约,我们曾以"流动的文本——俗文学文献学漫谈"(2021)为题,进行了切磋讨论,并在学术报告基础上,撰成四篇相关论文。其中潘建国《"俗文学文献学"若干问题刍议》,从学理层面阐述了构建"俗文学文献学"的学术缘由,复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流通学四大块面,对"俗文学文献学"的基本内容及展开路径,提出了若干初步构想。程芸《〈疏者下船〉的版本差异与意义空间——基于元杂剧"文本流动性"的考察》、吴真《俗文学的跨文体编创策略——以"召将除妖"主题为中心》、李小龙《如何凝固流动的文本——中国古代小说整理适用校法四例辨析》,则分别围绕元杂剧、说唱文学、小说校勘等领域个案的学术考察,深细地呈现了俗文学文本的流动性特质,以及由此引发的俗文学文献研究的新命题、新视野与新思考。我们想要特别强调的是,"俗文学文献学"并非为建而建,也不是纸上空谈,而是为了回应处置俗文学文献研究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所以,它虽然理应积极利用包括古典文献学、新建"写本文献学"以及西方校勘学在内的多种学术资源,但"俗文学文献学"必须主体构建在俗文学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即借助大量的研究实践,逐步完成其自身学术概念和理论体系的探索、累积和完善。这一定位意味着,"俗文学文献学"的构建过程,实质上具有足够的学科开放性,仰赖俗文学各分支文献研究者的共同参与和持续推进。本组文章,聊为抛砖引玉,期待能得到学界同好的批评和指教。

——潘建国

"俗文学文献学"若干问题刍议

潘 建 国

(北京大学 中文系, 北京 100871)

摘　要: 俗文学文献由印刷本及抄写本构成,它们总体上缺乏经典性,又受艺术体制特点的影响,其文本呈现出较为显著的流动性,并对古典文献学产生若干学术上的不适应,甚至学理上的冲突。故有必要在实践基础上,探索构建既取法古典文献学、又具有一定独立性和指向性的"俗文学文献学"。至于如何构建"俗文学文献学"? 笔者认为可以参照古典文献学的"三位一体"构成,结合俗文学文献的学术特性和实际情况,分别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流通学四大块面,展开相应的理论探索与学术实践。

关键词: 古典文献学;俗文学文献学;目录;版本;校勘;流通

中图分类号: I 207.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5919(2022)04-0108-11

收稿日期: 2022-01-12

作者简介: 潘建国,男,江苏常熟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一、关于"俗文学文献学"的构建缘起

古典文献学大致包含目录学、版本学及校勘学这三块"三位一体"的内容。其中，古籍版本学的研究对象，黄永年《古籍版本学》曾明确厘定为"只包括雕版印刷通行以来的刻本、活字本、抄本、批校本"，"不包括过去的竹木简书、帛书和卷子本"①；王欣夫《文献学讲义》则认为"所谓版本，并不限于雕版印刷的书籍，而实际上包括没有雕版印刷以前的写本和以后的钞本、稿本在内"②，虽将印本之前的写本纳入版本学，但细阅讲义第三章"版本"，涉及写本的文字不过寥寥数页，绝大部分篇幅皆在讨论印本情况。再看古籍校勘学，无论是清人阮元《十三经注疏校勘记》、俞樾《古书疑义举例》，还是今人向宗鲁《校雠学》、陈垣《校勘学释例》（原名《元典章释例》）等著述，均是对经史典籍校勘实践的通例提取和理论归结。因此，就其整体而言，古典文献学是主要以印本书籍为对象、以经史典籍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学术体系，它隐含着一个学术前提，即典籍具有基本明确稳定的文本面貌。据上可知，古典文献学实际上有其适用的学术范围，并非能够施之四海而通用。

首先对古典文献学产生"不适应"并提出要另建体系的，正是黄永年、王欣夫存在意见分歧的写本的研究者。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敦煌学界藤枝晃、荣新江、郑阿财等人，鉴于敦煌写本文献在形制、内容、字词、校读符号等诸多方面，都与后世刻本文献不同，不约而同地提出要从传统"版本学"中分化出一门新学问，建立所谓"写本书志学"（1981）、"敦煌写本学"（2001）、"写本学"（2006）③。关于这一学术构想最为集中的呈现，乃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2013），其"绪论编"第一章《写本文献学——一门亟待创立的新学问》，将写本文献划分为吐鲁番文书、敦煌文献、黑水城文献、宋元以来契约文书、明清档案、其他写本文献六大类，指出"我国传世的古书主要是宋代以后的刻本，有关古书的学问也多以刻本为中心展开。面对 20 世纪初叶以来突然冒出来的大批写本文献"，研究者"仍习惯于用刻本的特点去看待它们，因而整理和研究不免有所隔阂和误解"，呼吁对写本文献的"形制、纸张、笔墨、类别、内容、价值、语言、字体、符号、题名、断代、缀合、辨伪、校勘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展开全面系统的研究，为构建"文本文献学"奠定学术基础。④ 张著认为"敦煌写本文献学"是整个"写本文献学"的基石，故专设"字词编"（四章）、"抄例编"（八章）、"校理编"（五章）三编凡十七章，予以深细考述，令人印象深刻地展示了敦煌文本文献的学术复杂性，仅"抄例编"所涉各类写本符号，就涵盖"讹文与正讹""脱文和补脱""衍文和卜煞""错乱和钩乙""重文符号""省代、省书和省文""标识符号""双行注文整齐化"等八个面向，而如何处理这些学术问题，已超出了古典文献学的适用范围。

若将写本的时间再向前追溯，在敦煌遗书之前，还有书写于竹木简帛之上的先秦两汉典籍，这些"早期文本"的作者和文本生成问题，近几年来引起了海内外学者的关注，提出了不少有启发性的观点：认为受到书写制度和撰述传统的影响，上古时期个体著述意识尚未成熟，故作者问题相当复杂，"或没有具体作者，或作者记载模糊不确，或职业通称与作者别称混淆，或群体著述以个体方式署名" ⑤，与后世（尤其是印本时代）边界明晰的静态作者观差异明显；早期文本的"流动性"⑥较大，存在所谓"公共素

---

① 黄永年：《古籍版本学》，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9 页。

② 王欣夫：《文献学讲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63 页。

③ 分别参阅藤枝晃：《敦煌学导论》，南开大学历史系 1981 年油印本；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1 年版；郑阿财：《论敦煌俗字与写本学的关系》，《敦煌研究》2006 年第 6 期，第 162—167 页。

④ 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2—24 页。

⑤ 参阅赵敏俐：《中国早期经典的作者问题》，《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21 年第 6 期，第 78 页。

⑥ 参阅柯马丁《方法论反思：早期中国文本异文分析和写本文献之产生模式》，陈致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古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49—385 页。

材”,经由引录改写乃至叠加层累而形成新的意义,故文本的公共性与功能性是更为重要的问题,其作者、真伪或时代,反而“显得没有那么重要”①;而对于那些“写钞本时代”的“异质性”文本,“不应再以传统的辨伪学立场进行非此即彼式的‘真伪’考证,而应将其引入文本研究的中心,给予全面、系统的类型学研究”②,挖掘蕴涵其中的更为丰富的学术意义。虽然,对于上述观点学界仍存在不同意见③,但这些新观念的引入和展开,无疑将会凸显早期文本研究对于传统古典文献学的种种“不适应”,并进一步强化构建“写本文献学”的学术必要性。

作为印本时代之前的写本(无论是早期文本还是敦煌遗书)文献研究,它对基于印本书籍的古典文献学产生学术上的“不适应”,这是可以理解的,也可以说有其必然性。但是,中国俗文学④的发生、发展和繁盛,总体上均位于印本时代,俗文学书籍形态中印本也占据着相当高的比例,它与古典文献学之间,照理应该存在较为匹配融洽的学术关系,那么,为何还要提出构建专门的“俗文学文献学”? 俗文学文献研究对于古典文献学的“不适应”究竟又表现在何处? 兹从如下三个方面稍作申述:

其一,俗文学文本因缺乏经典性而产生不稳定性。

与写本相比,印本时代的典籍一般具有较高的文本稳定性,经过刊印,即可化身千万,形成所谓“定本效应”。不过,俗文学在古代长期被视作“不登大雅”的娱乐消闲书,遭到精英阶层的轻视摒弃,其文本缺乏经典性,故而在刊刻流播的过程中,极易发生变动,呈现出不稳定性。以古代通俗小说为例,刻本中存在字词句的讹脱衍乙,是十分常见的现象,它有时出于抄工刻工的疏忽大意,有时则是书坊为节省成本而故意为之,但小说读者对此罕有留意计较的。而更大的文本不稳定,乃源自通俗小说的商业出版竞争,书坊为制造销售牟利的“亮点”,往往擅自变动小说文本的卷帙回目,随意增删改易情节文字,形成特殊的“一书各本”现象⑤。譬如《水浒传》明刊本有所谓“文繁事简”的容与堂刊《李卓吾先生批评忠义水浒传》百回本,“文简事繁”的《新刊京本全像插增田虎王庆忠义水浒传》,“文繁事繁”的袁无涯刊《新镌李氏藏本忠义水浒传》百二十回本,还有金圣叹腰斩七十回文繁本《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各本情节文字均存在较大差异,难以确认哪个是“原本”哪个是“定本”。《三国志演义》存世明刊本众多,日本学者金文京曾据“花关索、关索故事之有无,再加以参酌周静轩诗、史书故事的插入及出版时地等其他条件”,将其分为六大系列,即没有花关索、关索故事的嘉靖本,有花关索故事的建阳刊本,有关索故事的建阳刊本(包括《三国志传》与《英雄志传》两大系),有关索故事的江南刊本(包括十二卷本与百二十回加评本两类),既有花关索又有关索故事的版本,清初毛宗岗评改本⑥。而这六大系列数十个版本,情节文字也存在较多差异,如何厘定《三国志演义》的“原本”或“定本”,是迄今未获解决的学术难题。再如演绎明代开国史事的小说,从明嘉靖抄本《国朝英烈传》(天一阁藏),到明万历刊六卷本《新刻皇明开运辑略武功名世英烈传》、明万历刊八卷本《新镌龙兴名世录皇明开运英武传》、明崇祯刊本《全像演义皇明英烈志传》,再到明末清初刊二十卷本《云合奇踪》,小说文本始终处在变动之中,同中有

---

① 参阅徐建委:《战国秦汉间的“公共素材”与周秦汉文学史叙事》(《中山大学学报》2012 年第 6 期,第 6—14 页)以及《公共性与早期文本的作者问题》(《文艺研究》2021 年第 8 期,第 52—63 页)。

② 程苏东:《写钞本时代异质性文本的发现与研究》,《北京大学学报》2016 年第 2 期,第 157 页。

③ 参阅傅刚:《也谈先秦文献所谓写抄本问题》,詹福瑞、张晓慧主编:《历史与建构:文学史研究与书写》,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21 年版,第 140—148 页。

④ 俗文学的界定有广义、狭义之分,参阅廖可斌:《俗文学研究的百年回顾与前瞻》,《武汉大学学报》2021 年第 1 期,第 77—86 页。本文乃择取广义界定中的小说(白话小说为主)、戏曲、说唱文艺(包括词话、评话、鼓词、弹词、唱本、宝卷、道情、子弟书、木鱼书等)三大类为俗文学之代表进行论述。

⑤ 郭英德:《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版本研究刍议》,《文学遗产》2005 年第 2 期,第 69—77 页。

⑥ 金文京为《中国古代小说总目》“白话卷”所撰《三国志演义》条目,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第 294 页。

异,异中有同,由首至尾,情节文字差异逐渐扩大,任何一个书名均难统摄指称。古代通俗小说文本的这种不稳定状态,显然不同于印本时代经史典籍的文本情况,因此,如果完全袭用古典文献学的概念和方法,则其书目著录、版本厘定以及文本校勘等,可能都会遭遇“不适应”而无法得到有效的展开,参见下文。

其二,俗文学因艺术体制特性而造成文本的流动性。

除了小说,俗文学还有另外两个大宗,即戏曲和说唱文艺,它们大体上皆属于表演艺术,其文本关联着口头与案头、场上与纸上,呈现出以表演功能效果为先的特性,临场发挥,随机改易,文本的流动性较之小说更为突出。譬如戏曲界素有“曲无定本”之说,作为一种舞台艺术,戏曲乃“借助演员的表演而与观众相沟通,但也因演员的理解与传授的不同,在演出中不断经受着改动”,“因戏班与剧种的不同,时代和社会条件的不同,演出对象的不同,同一作品,演来面貌不一,传世文本颇异”①,诸如《琵琶记》《西厢记》等戏曲经典作品,传世版本甚夥,却各有其独立存在的意义,据调查统计,目前可见明刊《西厢记》有 47 种,“尽管都是王实甫的《西厢记》,却几乎找不到有两个正文内容完全一样的版本”。② 这些《西厢记》明版之间的异文,实际上可能反映着某些搬演元素的差异,涵盖剧种、戏班、演员、地域、时代、场所、观众对象等不同面向,不宜按照古典文献学的异文校勘法进行校改统一。至于民间性、草根性更强的说唱文艺(包括词话、评话、鼓词、弹词、唱本、宝卷、道情、子弟书、木鱼书等),其文本的流动性就更为显著了,几乎不存在所谓“原本”“定本”的概念。戏曲和说唱文艺的文本流动性,主要是由表演艺术的体制特性决定的,是以“表演”而非“阅读”为中心的必然结果。因此,保留着不同搬演痕迹的各种异本,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它们是“平等的”,无须分出高下优劣;其作者是谁、刊刻抄录的年代早晚与精美与否,也不是决定其学术价值的关键因素;不能沿用古典文献学的版本观念对其进行评判和处置。

其三,产生于印本时代的俗文学“写本文献”。

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所列第六类“其他写本文献”,提及“国内外公私藏书机构还收藏有不少宋元以来的通俗小说、戏曲写本”,其中“颇多写本,也应该纳入写本文献研究的范畴”③,这是很有见地的。在俗文学的书籍形态之中,印本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但存世抄写本总量也非常可观,在某些俗文学分支中,抄写本甚至占据了主体,譬如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总计收录宝卷约 1500 种,若计入不同版本则有 5000 余部,“其中十之七八为手抄本”。④ 这些俗文学抄写本,剔除那些严格按照知见刻本传抄录副的本子,其他似皆可列入印本时代的“写本文献”。俗文学写本,大多是用于表演而非阅读的本子,诸如戏曲的梨园抄本、宣卷艺人自用的宝卷抄本等,其功能性是第一位的,至于文本作者、抄写者、抄写时间等因素,并不太重要。俗文学写本的流动性也非常突出,按照表演的实际需要,对内容随意增删改写,乃其常态和惯例。俗文学写本大量使用俗字、别字、异体字、同音假借字、记音字等,讹脱衍乙之处所在多是,也会涉及正讹、补脱、删除、钩乙、重文、省文等写本符号。可以说,印本时代的俗文学写本文献,一方面具有印本之前“写本文献”的某些共性特征,故同样对基于印本书籍的古典文献学产生学术上的“不适应”;另一方面,它毕竟是印本时代的“俗文学”,与写本时代的“早期文本”或“敦煌写本”又不尽相同,也不宜完全纳入构建中的“写本文献学”范畴。

总之,俗文学虽处于印本时代,其文本却因自身地位及体制特性,总体上缺乏稳定性,并呈现出类似写本时代的流动性,其中更有数量可观的俗文学文本实即印本时代的“写本文献”。因此,俗文学文献

① 黄仕忠:《〈全元戏曲〉的校勘特点和意义》,《中山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第 39 页。

② 陈旭耀:《现存明刊〈西厢记〉综录》“前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9 页。

③ 张涌泉:《敦煌写本文献学》,第 11—12 页。

④ 车锡伦:《中国宝卷文献的几个问题》,收入为《中国宝卷总目》“代前言”,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9 页。

研究有需要也有必要跳出传统古典文献学的概念体系和研究方法,在实践基础上,探索构建既取法古典文献学,又具有一定学术独立性和指向性的“俗文学文献学”。那么,如何构建“俗文学文献学”呢? 我个人认为,可以参照古典文献学的“三位一体”构成,并结合俗文学文献的学术特性和实际情况,分别从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流通学四大块面,展开相应的理论探索与学术实践。

二、关于“俗文学目录学”

由于长期处于不登大雅之地位,俗文学在古代官私目录(包括官修书目、史志目录、私人藏书目)中的著录几近空白。直至 20 世纪初,伴随着“小说界革命”“戏剧改良”等运动的兴起以及西方文艺思潮的传入,小说戏曲为代表的俗文学的社会地位与学术地位始得以提升,并且逐渐确立成为一门专学。自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以降,海内外学者持续对中国俗文学展开收集、调查和研究,推动了俗文学进入综合目录以及俗文学专科目录的编纂。迄今为止较为重要的成果计有:(1)白话小说: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33)、柳存仁《伦敦所见中国小说书目》(1967)、大塚秀高《增补〈中国通俗小说书目〉》(1987)、《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1990)、樽本照雄《清末民初小说目录》(1992)、《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 白话卷》(2004)。(2)戏曲:傅惜华《元代杂剧全目》(1957)、《明代杂剧全目》(1958)、《明代传奇全目》(1959)、《清代杂剧全目》(1981)、郭英德《明清传奇综录》(1997)。(3)弹词:胡士莹《弹词宝卷书目》(1957 初版、1984 增订)、谭正璧谭寻《弹词叙录》(1981)、盛志梅《中国弹词书目知见综录》(2022)。(4)宝卷:傅惜华《宝卷总录》(1951)、李世瑜《宝卷综录》(1961)、泽田瑞穗《宝卷提要》(1975)、车锡伦《中国宝卷总目》(2000)、《苏州戏曲博物馆藏宝卷提要》(2018)、骆凡、王定勇《扬州大学图书馆藏宝卷》(2021)。(5)鼓词:李豫、李雪梅等《中国鼓词总目》(2006)。(6)子弟书:傅惜华《子弟书总目》(1946)、黄仕忠、李芳、关瑾华《新编子弟书总目》(2012),等等。

检阅上述成果可知:小说戏曲类书目的编制相对较为充分,其他说唱文艺类书目仍有较大的扩增续编空间;部分书目乃经实物调查编就,部分书目则多据二手目录资料编缀而成,尚需核查藏本予以补订。事实上,目录编修与学术调查研究是相辅相成的,俗文学书目的编修和完善,仍有赖于俗文学研究的推进和细化,可谓长路漫漫。在此过程中,尤需关注思考如下目录学问题:

(一)关于俗文学文献的分类归属

包括两个层面,其一是俗文学在综合目录中的类目设定和著录位置。目前各家书目处置不一,有在“子部 · 小说家”之下设置三级子目录“章回(演义)小说之属”或“短篇”“长篇”著录白话小说,有在“集部”之下设置二级子目录“曲类”“小说类”分别著录戏曲和白话小说,也有在“经史子集”之外另立一级目录“小说戏曲”予以著录者。这是否需要统一? 如何统一? 除了小说戏曲,目前仅有极少量弹词宝卷附录于综合性目录的“集部 · 曲类”之下,俗文学其他分支作品基本上还未予著录。它们如何进入综合目录? 是否应有独立类目? 如何设置? 俗文学各分支之间如何确立文体边界? 种种问题皆有待探讨解决。

其二是俗文学专科目录的著录方式。专科目录是俗文学目录的主要形式,采用何种著录方式是首要考虑的问题。目前相对成熟的是小说戏曲目录,但也未形成稳定的著录方式,以白话小说为例,孙楷第《中国通俗小说书目》以体裁和题材分类著录,《中国通俗小说总目提要》大致以作品成书时间先后为序著录,《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 白话卷》则以书名首字音序排列著录,三部专科目录的著录方式居然都不一致。至于说唱文艺,《中国宝卷总目》按照书名首字音序排列;《中国鼓词总目》先按时间分为“中国传统鼓词”“抗日解放战争时期鼓词”“共和国时期鼓词”三个时段,各段中则以书名首字音序排列;《新编子弟书总目》则据题材分为“商周故事”“秦汉故事”及“《红楼梦》子弟书”“《聊斋志异》子弟书”等 12 类著录,三类目录的著录方式也各不相同。需要指出的是,俗文学专科目录多采用“音序”方式著录,实

质是“避重就轻”的权宜做法,它回避了复杂的分类问题,譬如鼓词,依据“文本形式分有旧鼓词和新鼓词、说唱相间和只说不唱”,“类别上分有鼓词、鼓书、大鼓、子弟书”,“篇幅上分有中长篇和短篇”①;而宝卷的功能性和地域性更为突出,笔者家乡常熟的民间讲经先生根据用途,将宝卷分为素卷(讲食素神佛的)、荤卷(讲食荤神佛的)、冥卷(夜晚宣讲的)、闲卷(非佛事所用、娱乐消遣的)、科仪卷(做仪式的),这一分类法曾为《中国常熟宝卷》(苏州:古吴轩出版社 2015 年版)编者所采用,却未必完全适合其他地区宝卷。然而,尽管俗文学文献分类是一个棘手难题,但专科目录不能满足于简单的“音序”著录方式,仍需通过深入的调查研究,探索出行之有效的分类体系,并运用到目录编制实践之中,以丰富和增强俗文学专科目录的学术功能。

(二)关于俗文学文献的著录要素

俗文学文献的著录要素,包括书名、卷(回)数、作者、存佚、书籍形态(写抄或刊刻)、版本版式、成书及抄刻时间、图像、序跋题识、藏印藏处等,与古典文献学的书籍著录项亦大致相近,但其侧重和内涵实有所不同。譬如“作者”一项,有相当比例的俗文学文献,并无作者,或作者身份不明,或作者题署具有某种特殊性②,著录时须区别对待;而“图像”是小说戏曲弹词宝卷鼓词的特色项,应详加记录。其中,最值得讨论的是“书名”项,俗文学文献“同书异名”现象较为突出,著录时多采用“别题”或“参见”方式予以标识,另在目录之末附载“同书异名书目通检”“异名索引”,以方便检索使用。俗文学文献还存在一种较为麻烦的情况,那就是“同名异书”现象,尤其是戏曲和说唱文艺,因受场上艺术体制功能的影响,其文本具有较大流动性,同一作品的不同写抄本或刊印本,文字内容往往存在差异。如果差异不是那么大,尚可视作同一作品的不同版本,附录于同一个条目之下;但差异大到一定程度,就变成了一种新书,需要另立条目。如何把握差异从量变到质变的分寸? 同书异版和另立新条之间的分界怎样去划定? 这一切,大概只能在大量细致的研究实践中去探索和总结。而俗文学目录越是精准地区分标识出同书异名、同书异版、同名异书等复杂情形,无疑也越具有学术参考价值。

(三)关于编制俗文学文献联合目录(索引)

白话小说、戏曲及说唱文艺诸分支之间,虽有体制和体裁上的区别,但其演绎的题材内容,往往存在颇为密切的关联,同一人物故事流传着不同的俗文学文本,呈现出跨文体、跨区域、跨时段流动的特征,这些现象,启发和推动着学界展开俗文学的整体研究。在各种专科目录不断编印的基础上,酝酿编修中国俗文学文献联合目录(索引),既是整体研究的题中之义,也有助于奠定其学术基础。至于这部联合目录(索引)应采用何种分类体系和著录方式,尚待探索研究。譬如考虑到俗文学本质上均为叙事文本,采用以“故事”为核心指标的著录体系,在同一“故事”单元之下,编集著录所有知见之俗文学文本及版本,或许也是值得尝试的学术方案之一。

三、关于“俗文学版本学”

参照古籍版本学,俗文学版本学的内容大致可分为版本术语、版本鉴定及版本研究三个部分。先来看版本术语,古籍版本学已形成了极为丰富的版本术语,包含关于书叶板框装帧等方面的术语(如版心、鱼尾、象鼻、书耳、界格、边栏、行款、书根、书口、内封、牌记、蝴蝶装、包背装、金镶玉、函套等),以及根据刊印朝代、机构、地区、技术、开本、刷印时间、流传状态等因素拟定的版本名词(如宋刻本、元刻本、官刻本、坊刻本、建阳本、蜀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原刻本、翻刻本、初印本、后印本、孤本、善本

---

① 李豫、李雪梅、孙英芳、李巍:《〈中国鼓词总目〉编撰分段依据及理论探讨》,收入《中国鼓词总目》“代前言”,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4 页。

② 参阅陈洪、张昊苏:《从作者研究谈白话小说文献学的基源问题》,《文献》2022 年第 1 期,第 4—14 页。

等),这些版本术语和名词,大部分可为俗文学版本学所移用。但两者在版本的类型分布和价值倾向上,存在差异明显:古籍版本学所推重的诸如宋元本、黑口明初本、白棉纸嘉靖本、官刻本、影抄本、名家手稿本、批校本等等,俗文学基本上付之阙如。俗文学刻本,绝大部分为明代万历以降的坊刻本;俗文学抄本,大多出自底层文士、民间艺人及普通读者之手,与古籍版本学所云名家旧抄不可同日而语。俗文学另有不少古典文献学未曾或较少关注的版本形态与版本关系,譬如插增本、绣像本、评点本、析出单行本、报刊连载本、梨园抄本、馒头铺抄本、铅印本、石印本、洁本与足本、繁本与简本、墨本与台本、古本与今本、原本与改本、总本与角本等,它们充分体现了俗文学的文献特性。如何进一步完善俗文学的版本术语体系,是俗文学版本学的重要学术课题。

再来看版本鉴定,古籍版本鉴定的目的主要有两项,一是确认版本身份,二是辨别真伪。俗文学文献长期以来文化和文物地位皆不甚高,故甚少涉及真伪问题(如古籍中以明人翻宋本冒充宋本、以普通抄本冒充名家抄本、伪作名家题跋藏印等),版本鉴定的任务就是确认版本身份,主要是版本时间。古籍没有现代书籍的版权页,部分古籍印有刻书牌记或内封页,可据此大致确认刊刻时间和刊刻者,但更多古籍连牌记或内封页也没有,这就需要根据版式、字体、纸张、刻工、序跋题署、避讳等多方面因素,综合判断其刊行(抄录)年代①。古籍版本鉴定的这些标尺,在俗文学版本鉴定中总体有效,但须谨慎酌定,因为版式、字体、避讳之类,在俗文学版本中呈现出的状况,要比在经史诗文典籍中来得宽松随意,不宜遽断,尤其是不能根据单一标尺匆忙下结论。有一些在古籍版本鉴定中作用甚微的标尺,在俗文学版本鉴定中却颇为有效。譬如图像,这是小说戏曲文本的特色内容,故其款式(上图下文、单幅整页、双幅整页、月光型)、构图(情节性插图、人物绣像)、风格(金陵派、徽派、苏州派、闽派)以及画工刻工姓名,具有版本鉴定的辅助功能,仅仅根据图像一项,大致可以判断一部小说戏曲文本,它是明刻本还是清刻本,是清代前期刻本还是中后期刻本,是福建建阳刻本还是江南地区刻本,若再附加其他因素,判断就能更加精准。另外还有一些标尺,古籍版本与俗文学版本鉴定时都有参考,但侧重点不同。譬如纸张,古籍版本鉴定侧重利用纸张的质地和帘纹特征(宽与窄),诸如宋元白麻纸黄麻纸、明中前期白棉纸黄棉纸、明末清初汲古阁刻书所用毛边纸、清代内府刻书所用开花纸、近代书局所用机制纸等;而俗文学版本鉴定则侧重利用纸张大小即书籍的开本尺寸,俗文学出版商业色彩强烈,纸张大多使用廉值的竹纸,而且在书籍开本上存在从明至清逐渐变小的趋势,以节约成本。大体上,明代江南刻本大于建阳刻本,明代刻本大于清代刻本,清代前期刻本大于中后期刻本,因此,就俗文学版本而言,“大本”与“巾箱本”是两个重要标尺,大致以清代嘉庆朝为界,之前“大本”为主,之后“巾箱本”为主;而在同一部俗文学作品的不同版本之中,“大本”的刊刻时间通常要早于“巾箱本”。总之,俗文学版本鉴定有其自身的特点和规律,需在实践中不断加以探索和归结。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俗文学中的戏曲与说唱文艺来说,版本鉴定除了确定版本身份之外,还有更为重要的辨识其场上体制特征的用途。孙崇涛《戏曲文献学》曾指出:戏曲版本鉴定“不仅是为了确定文本的年代、文字真伪、讹正、衍脱等现象,更重要的是,戏曲版本是作为综合艺术的戏曲的综合形态反映。戏曲版本鉴定是我们借以识别文本性质与用途,演剧形态与地域,剧目传布与流变,乃至剧种与声腔、班社与演员、剧场与形制等等各方面情形的重要依据,所以戏曲版本鉴定具有它更丰富、更独特、更重要的内涵”。② 这是相当精辟的,庶可用来概括说唱文艺版本鉴定的学术功能。站在这一角度,俗文学版本

① 关于古籍版本鉴定的标尺和方法,可参阅黄永年:《古籍版本学》;王雨:《古籍版本学》,《王子霖古籍版本学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

② 孙崇涛:《戏曲文献学》,第二编“戏曲版本学”第一章“戏曲版本的特殊意义”,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117 页。

价值观也随之发生改变,譬如古籍版本学通常会将刊刻(抄写)精整、纸墨精良的版本视为善本,而将那些抄刻粗糙、纸墨欠佳、讹字俗字连篇的版本,称为坊间劣本,但此类“劣本”,却可能因为保留了更多的场上艺术特点,而在俗文学版本学中跃升成为具有独特学术价值的珍善之本。

最后来看版本研究。古籍版本研究的学术目标在于“考镜源流”,即梳理出一部典籍成书、刊行及流传的过程,复将存世各版本置于此流播史链条之中,确立其各自位置和彼此关系,并遴选出其中的最善之本。这一研究理念,深刻影响了俗文学版本研究,可以说,对某部俗文学作品现存诸版本进行考证并划分系统,乃是目前俗文学版本研究的主体,并已产生了一些方法论层面的思考与总结,譬如学者赵益曾考察了古代通俗小说文本的“窜句脱文”现象,就其文献学原理以及在小说版本研究中的运用,作出学理探讨①;笔者也曾提出过在古代小说版本研究中建立“版本标记物”的设想②,所谓“版本标记物”,即指某一版本所特有的、能够成为其身份识别之关键的版本特征,包括特定文字的增补、删削、剜改、窜行、挤行、空白、墨钉、异常文图错讹等,借助“版本标记物”,追踪考察其在现存版本中的有无及其变化,可以相对有效地厘清复杂的版本关系。毋庸赘言,这一领域的学术空间仍十分巨大,在研究实践中不断总结俗文学版本研究的方法与规律,是值得期待的。必须要指出的是,古籍版本研究侧重溯流追源的学术理念,也给俗文学版本研究带来了一定的困扰,诸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等小说经典,以及《西厢记》《琵琶记》等戏曲经典,虽然存世明刻本数量可观,却无法确定哪一个是“原本”哪一个是“定本”,因此,难以像经史诗文典籍那样考定“原貌”,勾勒线性流变,绘制出关系明晰的版本源流树。此外,如前所述,作为场上艺术,戏曲与说唱文艺的不同版本,保留着不同的搬演痕迹,往往各具价值,无所谓优劣之分,隐含在版本之中的艺术体制内涵,才是研究者着意要去挖掘的。凡此,表明俗文学版本研究,既与古籍版本研究具有一脉相承之处,也存在自己独特的学术面向和追求。

四、关于“俗文学校勘学”

校勘学是一门基于文本整理实践的学问。昔年陈垣通过校勘《元典章》获取了一万两千余条校勘记,从中提炼出 42 条通例,又进而总结出“对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种校勘法,撰成《元典章释例》(后更名《校勘学释例》)。后来这些通例和校勘法,在古籍校勘中得到广泛运用,俗文学校勘自亦不例外,受益良多,但同时也显现出对校勘四法的若干学术“不适应”。

譬如“对校法”,即以同书之祖本或别本对勘,这是古书校勘的最基本方法,被誉之为“校勘学的灵魂”③。但《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厢记》《琵琶记》等书,皆不知“祖本”为何本,失去了对校的标准参照物。若以《三国志演义》两个嘉靖本(壬午本与叶逢春刊本)对校,异文数量可观,部分异文可以彼此纠谬正讹,部分异文则两本皆通,因缺少“原本”,无法通过对校而定其是非。富有古籍校勘和古小说校勘经验的程毅中认为:“至于许多世代累积型的小说,更难以求原著之是非,只能因书而异,因读者对象而采取不同的整理法”④,洵为知者之言。即便是文人独创性质的《红楼梦》,无论是脂本之间的对校,还是程甲程乙对校,亦时有难以取舍之处,最经典的例子,就是第七十六回中黛玉的凹晶馆联句,有些版本作“冷月葬诗魂”,有些版本作“冷月葬花魂”,孰是孰非,红学界莫衷一是,但曹雪芹原稿究竟作什么,今天已不可知,“花魂”与“诗魂”纵然可以在艺术审美层次上分出轩轾,站在校勘学立场,它们大

---

① 参阅赵益:《“窜句脱文”及“错误一致原理”与通俗小说版本谱系考察》,《文献》2020 年第 6 期,第 170—188 页。

② 参阅潘建国:《明代公案小说的文本抽毁与版本流播——以余象斗〈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为例》,《文学遗产》2020 年第 4 期,第 139—152 页。

③ 胡适:《元典章校补释例序》,收入陈垣:《校勘学释例》,北京:中华书局 2006 年版,第 11 页。

④ 程毅中:《再谈求是与择善》,《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0 年第 3 期,第 5 页。

概只能两存其说,不能彼此否定。再譬如“他校法”,即以他书校本书,这在文备众体内容庞杂的俗文学校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必须要考虑到一点,小说家征引素材,虚虚实实,化而用之,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误读误解,也是常有,不可一概坐实理解,运用“他校法”校勘时应格外谨慎。仍以《三国志演义》为例,小说文本以史书《三国志》为基本素材敷演而成,无论是人物、事件、时间、地理,还是名物、职官、典章,甚至是具体文字细节,多可在《三国志》中找到相应记载,但罗贯中出于小说创作需要,往往故意“改动历史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或者对它们的前因后果,作出背离史书的新的解释”,当然,也有不少属于作者“没看清或没弄懂史书语句”①导致的错误演义,这些有心之“误”与无心之“失”,如果采用“他校法”,根据《三国志》等史籍加以一一改订,就不仅失去了俗文学的通俗面目,恐怕也消解了小说作者的某些艺术匠心。

至于戏曲和说唱文艺在运用校勘四法进行文本校勘时,碰到的问题要比白话小说更多,其“不适应”性也更明显。因为,校勘学的核心理念是借助版本比勘获得异文,并经审定是非,最终消除异文。但戏曲和说唱文艺不同版本之间的异文,却有可能保留着不同的搬演痕迹,具有独特价值,不宜消除。于是,校勘整理文本与保存搬演痕迹之间,产生了学理层面的冲突,“是关注戏曲本身的特点而灵活处理,还是以经史与诗文的传统校勘方式行事？各人所持,自有不同”②。美国汉学家奚如谷在考察了《窦娥冤》版本校勘情况之后,认为“戏剧《窦娥冤》是一个抽象的存在,可以依存于一个或多个剧本中,但同时又独立于一切剧本”“任何一个剧本都不等同于这部剧,因为剧本仅仅是演出的一部分”“每个版本,每次校订,本质上都制造出一个新的剧本,它和其他版本的关系是既相互联系,又各自独立”③,这样的观点虽不无道理,却难免有些失之偏颇。戏曲文本的校勘整理,自然不可能“因噎废食”,或许平衡好两者关系,探索出一套适合于戏曲和说唱文艺的文本校勘法,才是研究者的努力方向。

令人欣喜的是,目前国内俗文学文本整理与研究,方兴未艾,依托大量的校勘实践,模仿陈垣当年的做法,撰写出诸如《古代小说校勘释例》《戏曲校勘释例》《宝卷校勘释例》《子弟书校勘释例》之类的专论,进而汇总、提炼出俗文学校勘的通例和方法,实所期待。至于俗文学校勘学,如何在吸收古籍校勘法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的特色,学界也已有了一些初步想法,譬如古代小说学者提出要突破狭义校勘的限制,把单一的“文字校勘扩展到综合整理”,建立新的“小说校雠学”④;木鱼书研究者亦提出:“审读木鱼书等俗文学文献,正可以从文本的变迁来反观各个时期社会观念、审美观念和语言本身的变化,这也是俗文学校勘研究较之传统经籍与诗文校勘的不同之处”⑤,凡此,都似乎共同指向一个符合俗文学文献特点又带有综合色彩的校勘法,笔者认为不妨称之为“体制校勘”,它与从中古文言小说校勘实践中提炼出来的“体例校勘”⑥,正可以视为俗文学校勘对于传统古籍校勘学所作出的学术拓展和有益补充。

五、关于“俗文学流通学”

如果把书籍完成印刷或抄录之后的阶段界定为“流通”的话,那么所谓“流通学”就是研究书籍的装

---

① 参阅周兆新:《〈三国演义〉与三国历史的区别》《罗贯中误解史书二十例》等文,原载氏著《〈三国演义〉考评》,收入《周兆新元明清小说戏曲论集》,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49、170 页。

② 黄仕忠:《〈全元戏曲〉的校勘特点和意义》,《中山大学学报》1998 年第 2 期,第 39 页。

③ 奚如谷:《〈窦娥冤〉之冤:臧懋循改编元杂剧研究》,《海内外中国戏剧史家自选集·奚如谷卷》,郑州:大象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316 页。

④ 程毅中:《〈稗家粹编〉整理与研究的新发现——兼谈古代小说的校雠学》,《光明日报》2019 年 1 月 19 日第 9 版。

⑤ 关瑾华:《校勘俗文学文献的方法——从〈第八才子书花笺记会评会校本〉校记之商榷谈起》,《广州大学学报》2009 年第 8 期,第 19 页。

⑥ 李剑国:《〈李娃传〉疑文考辨及其他——兼议〈太平广记〉的引文体例》,《文学遗产》2007 年第 3 期,第 79 页。

订、销售、购买、租借、转抄、典藏等环节的学问。由于俗文学文献长期以来不受重视,相关旁证记载极度匮乏,而古书又无版权页,故欲考察“俗文学流通学”殊为不易,目前的学术研究相对最为不足。

检阅现有的学术成果,可以发现它们具有相似的理路,即从书籍实物调查入手,利用留存于书叶上的各种讯息,作出有限度的考索推论。早在 20 世纪 30 年代,李家瑞发表《清代北京馒头铺租赁唱本的概况》,即借助现存鼓词抄本封面上钤盖的租书铺印章戳记,考察北京永隆斋、兴隆斋、永和斋等铺子租借鼓词唱本的规则、时长、费用、书目等细节问题。① 之后,关于明清白话小说戏曲书价与读者的探究②,也主要利用了少量明版书籍内封页上钤盖的价格木戳,譬如明万历金阊舒冲甫刊本《新刻钟伯敬先生批评封神演义》每部纹银二两、金阊龚绍山刊本《陈眉公先生批评春秋列国传》每部纹银一两、安徽百岁堂刊本《新刻出像点板吕真人梦境记二卷》每部纹银二钱、福建金魁刊本《新调万曲长春》每部纹银一钱二分等。近来,赵益发表论文《“装订”作为书籍“交流循环”的环节及其意义——一个基于比较视野的书籍史考察》③,乃借鉴西方书籍史研究中的“交流循环”(communications circuit)视角,基于书籍“装订”环节,来解释古代通俗小说版本中常见的一书之内题刻有多家坊名的现象,虽然引发这一现象的原因相当复杂,需要逐个勘查处理,未必能以“装订”作出系统性的解决,但赵文引入古典文献学极少注意的“装订”环节,无疑富有启发性,也是俗文学流通学未来可以拓展的学术新面向。至于鼓词、唱本、宝卷、道情、木鱼书等说唱文艺,则勾连着更为草根性的城乡世俗民众,文本的编撰和生产,从明清一直延伸到 20 世纪乃至当下,故其流通学的内涵和外延,恐怕也与小说戏曲同中有异,需要研究者在实物调查的基础上,作出相应的细致考察。

此处还须特别提一下俗文学的典藏问题。与经史典籍历代递藏有绪不同,迟至 20 世纪初期,俗文学文献才得到公私两方的留意搜存,其典藏史大多不足百年,却与学术史同步共振。俗文学典藏之中,私人收藏占有特殊地位,早期的小说戏曲研究者(如吴梅、鲁迅、胡适、马廉、郑振铎、王孝慈、周越然、傅惜华、孙楷第、阿英、齐如山、胡士莹、赵景深、谭正璧等),几乎都是藏书家,而他们苦心搜罗的藏书,后又化私为公,成为若干著名图书馆俗文学馆藏的主要来源。中国俗文学的海外典藏也颇为令人注目,从东亚到西洋,从南洋到北美,俗文学典籍飘洋渡海,往往有迹可循。其中,日本存藏的中国小说戏曲,无论质量还是数量,皆堪可媲美中国本土。在我看来,海外存藏汉籍的学术意义,经史子集各不相同,且与其在中国本土的存藏情况成反比。经史典籍国内存藏大体完备,海外汉籍的意义是局部性的、补充性的;但对于小说戏曲(特别是明代及清代前期版本)而言,由于国内藏本的不足,海外汉籍的意义可能是整体性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此,如何在全球书籍史的视野下,持续地展开中国俗文学文献的追踪、调查、著录、影印、整理及研究,已越出流通学的范畴,成为整个俗文学文献学的重要课题之一。

以上,我们简要阐明了构建“俗文学文献学”的学术缘由,并就个人管见,对其基本内容及展开路径,提出了若干初步设想,抛砖引玉,聊供学界同好批评和讨论。最后,我想要强调的是,“俗文学文献学”并非为建而建,也不是纸上空谈,而是为了回应处置俗文学文献研究中遇到的种种实际问题,因此,它虽然可以积极利用吸纳包括传统古典文献学、新建“写本文献学”以及西方书籍史、校勘学理论在内

---

① 李家瑞:《清代北京馒头铺租赁唱本的概况》,《大公报·图书副刊》第 119 期,1936 年 2 月 27 日。

② 参阅大木康:《关于明末白话小说的作者与读者》,《明代史研究》1984 年第 12 期,第 1—15 页;潘建国:《明清时期通俗小说的读者与传播方式》,《复旦学报》2001 年第 1 期,第 118—124 页;宋莉华:《明清时期说部书价述略》,《复旦学报》2002 年第 3 期,第 131—140 页;黄卉:《明代通俗小说的书价与读者群》,收入 2004 年 8 月举办《第十届明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石超:《明代戏曲刻本价格考论》,《戏剧》2017 年第 5 期,第 80—88 页。

③ 赵益:《“装订”作为书籍“交流循环”的环节及其意义——一个基于比较视野的书籍史考察》,《中国出版史研究》2021 年第 3 期,第 114—127 页。

的多种学术资源,但“俗文学文献学”必须主要构建在俗文学文献研究的基础之上,即借助大量的研究实践,逐步完成自身学术体系的探索、累积和完善。这一定位意味着,“俗文学文献学”的学术构建过程,实质上具有足够的学科开放性,仰赖俗文学各分支文献研究者的共同参与和持续推进。

A Discussion on Some Issues Concerning “Philology of Popular Literature”

Pan Jianguo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Abstract: As ancient Chinese popular literature was composed of printed and hand-written texts, which were generally not of enough classical nature but influenced by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rtistic mechanism, these texts presented remarkable fluidity and produced some academic inadaptability and even theoretical conflicts with classical philolog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philology of popular literature” on the basis of practice, which not only adopts classical philology, but also has certain independence and directivity. How do we construct “philology of popular literature” The author holds that the “trinity” construction of classical philology can be used for reference, and at the same time, combined with the academic characteristics and practical situation of “philology of popular literature”. The theoretical exploration and academic practice can be carried out from such four aspects as bibliography, bibliology, textual criticism and circulation.

Key words: classical philology; philology of popular literature; bibliography; bibliology; textual criticism; circulation

(责任编辑　　郑　园)